

■历史·民族研究

## 建文政局与洪武勋贵家族

吴如功, 胡凡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作为洪武朝的政治遗产,建文时期,洪武勋贵家族积极参与了建文帝削藩的政治决策过程,并直接执行了对燕王朱棣的军事行动。但由于建文帝及左班文臣对勋贵家族态度的日益转变,以及洪武勋贵家族身为武臣集团核心同燕王朱棣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这一群体日益失宠并受到打压与怀疑。最后建文政局在“靖难之役”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下走向崩溃,洪武勋贵家族自身也在随后的清洗中瓦解与重组。从而证明,洪武勋贵家族在建文朝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群体政治地位的动摇是建文政局动荡的重要诱因。同时,洪武勋贵家族对建文政局的多重影响是由其政治角色的矛盾性所决定的。

**关键词:** 建文政局;洪武勋贵家族;靖难之役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6)03-0081-06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03.022

## Political Situation of Jianwen Time and Political Heritage of Hongwu Reign

Wu Ru-gong, Hu Fan

(Center of Heilongjiang River Basin Civilization Studi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s the political heritage of Hongwu Empire, the noble family of Hongwu took an active part in Jianwen Emperor's decision making of weakening kingdoms and personally initiated a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Prince Yan Zhudi during the Jianwen Period. However, with Jianwen Emperor and the civilian officers changing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the Hongwu family, who as the main strength of Jianwen's military force is inextricably connected with Prince Yan Zhudi, the noble family of Hongwu gradually fall into disfavor and thus are depressed and skepticized by the court. Finally, Jianwen Empire collapsed as a result of series of military failures in Jingnan Campaign and the noble family of Hongwu was also crushed and regrouped. This indicates that in Jianwen Empire, Hongwu family ranked a decisive position, the collapse of which lead to the overthrow of Jianwen. At the same time, the great influence brought by Hongwu to the court is decided by Hongwu family's political contradiction.

**Key words:** Political situation of Jianwen Emperor; the noble family of Hongwu; the Battle of Jingnan

洪武勋贵作为明太祖朱元璋夺取天下的基干力量,是支撑明初皇权不可或缺的支柱之一,这一群体与明皇室及明初政局的关系颇有值得研究之处。勋臣旧将及其亲眷以军功贵族身份担任官职,受到皇帝颁赐可以世袭的免死铁券,同时与宗室通婚,俨然有结为尾大不掉的贵族集团的风险。明太祖朱元璋为制衡勋贵集团势力,厉行打击勋贵成员之不法行为,又兴胡蓝之狱,翦除勋贵家族在军队中的影响

力;同时加强边塞诸王军权,与勋贵担任之总兵官相互牵制,最终在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结束后,将勋贵集团瓦解成为若干个对朝廷恭顺忠诚且彼此间联系松散的家庭单位。另外又注重培养锻炼勋贵家族的接班人,与老一代勋贵组成有层次的权力梯队。因而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之后,经过改造的洪武勋贵家族迅速成为了新即位的建文帝朱允炆赖以削藩及讨伐燕王叛军的可靠保证。

**收稿日期:** 2015-10-22; **修回日期:** 2015-12-22

**作者简介:** 吴如功,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胡凡,男,吉林东丰人,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明清史、中国文化史和文化学理论。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洪武勋贵家族视为一个政治利益共同体,从整体上分析其政治地位的沉浮对建文政局之影响,为建文朝政治研究提供一个新的交叉视角,并以此就教于学者方家。

## 一、建文朝肇始时洪武勋贵家族的情况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辛卯,皇太孙朱允

炆奉明太祖遗诏即皇帝位,年号建文。长达四年动荡而悲壮的建文时代就此拉开序幕。此时在洪武年间受封的勋贵群体尚存二公爵、七侯爵、一伯爵、占洪武年间受封及子孙承袭之公侯伯爵 89 位中的 11%。(见表 1)

表 1 建文时期公侯伯表

	爵位名称	封爵(袭爵)人物	封爵(袭爵)时间及承袭缘由	与皇室之姻亲关系
二公 <sup>[1]卷125.列传第13</sup>	魏国公	徐辉祖	洪武二十一年十月丙寅袭,父徐达以开国功受封	长妹为燕王妃(仁孝皇后);次妹为代王妃;三妹为安王妃。
	曹国公	李景隆	洪武十九年四月丁酉袭,父李文忠以开国功受封	祖母为太祖姊曹国长公主;父李文忠为太祖外甥;一女为晋王子平阳王济熿妃。
七侯	长兴侯	耿炳文	洪武三年十一月以开国功受封	长子耿璘尚懿文太子长女江都公主
	西平侯	沐晟	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袭,父沐英以开国功受封。兄沐春	父沐英曾为明太祖养子
	武定侯	郭英	洪武十七年四月以平滇功受封	妹为太祖宁妃; 子郭镇,尚永嘉公主; 两女分别为辽王与郕王妃
	江阴侯	吴高	洪武十七年五月辛酉袭。父吴良以开国功受封 二十八年坐事谪广西,建文初召还复爵	一女为湘王妃
	安陆侯	吴杰	洪武十九年四月袭。父吴复以征西功受封	父吴复有二孙女,一为齐王妃;一为唐王妃
	越雋侯	俞通渊	洪武二十五年六月戊午以征南功受封。二十六年五月以老迈除爵闲住,建文初召还	无
	凤翔侯	张杰	建文中袭,祖父张龙以征西功受封	父张麟尚福清公主
一伯	诚意伯	刘廌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辛丑袭,二十五年谪戍,后赦还。祖父刘基以开国功封	无

另外除表中承袭爵位公侯伯外,洪武朝诸驸马都尉中有梅殷(汝南侯梅思祖从子,尚宁国公主)、胡观(东川侯胡海子,尚南康公主)属于故洪武勋贵家族成员出身;另外又有谷府长史刘璟(诚意伯刘基次子)、都督廖镛、廖铭兄弟(德庆侯廖永忠孙)等人虽同出身洪武勋贵家族,但以流官而非世官身份参与建文朝政治,上述人物共同构成了洪武勋贵家族人物关系的基本脉络。

且由上表可见,洪武三十一年尚存的洪武勋贵家族成员主要可分为正常承袭或受封爵位的;曾经承袭或受封爵位,后因事革除,建文时期恢复的;曾经承袭或受封爵位,因事革除后并未恢复,以流官参与建文政局三大类。而就其权力布局而言,基本秉承了洪武体制的设计,诸公侯伯主要担任了右班武臣,职能多为军事方面,个别以流官身份担任文职;同时诸勋贵家族基本与皇室保持着稳定的联姻关系,以魏国公徐辉祖与武定侯郭英两个家族表现得

最为明显。但权贵家族彼此之间的关系则比较薄弱,通婚关系相比洪武朝大为减少,此时虽有共同的权力起源及利益瓜葛,但难以形成“血缘+地域”为基础的勋贵集团,这也是为何要从松散的“政治群体”而非政治联盟的角度分析诸洪武勋贵家族的原因。

另外,这一时期驸马都尉身份的特殊性也很值得注意,因为受到胡蓝之狱牵连而除爵的勋贵家族成员往往因驸马身份而得以身免,梅殷与胡观政治身份的得以保留并在建文朝发挥作用,与这种惯例也有一定关系。

上述局面的形成,与朱元璋在洪武朝晚期的设计是分不开的。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后,朱元璋着手重新审视勋贵群体在洪武体制中的地位,首先分别在洪武二十六年六月丁酉、七月癸丑两次调整五军都督府都督佥事人选,将徐增寿、李增枝、沐晟、耿璘等一批勋贵家族成员分任各职,在三年的锻炼后,

洪武二十九年三月癸未正式任命徐增寿为右军都督府左都督;李增枝为前军都督府左都督;沐晟为后军都督府左都督<sup>[1]</sup>卷228,洪武二十六年六月丁酉条;卷229,洪武二十六年七月癸丑条;卷245,洪武二十九年三月癸未条;这一过程除了填充因蓝玉案空缺的军职,培养第二代勋贵外,也是对经过政治风波考验的可靠勋贵家族的一种奖励与扶植。

另外作为新一代勋贵中的重点培养对象,除三次以勋臣功颁赐魏国公徐辉祖与曹国公李景隆等人钱钞外,洪武时期二人主要从事练兵工作,熟悉军队并积累军功。如征南战役结束后,令诸军分驻湖广各卫练兵,徐驻常德,李驻安陆;洪武二十四年又令徐、李等往陕西等处防边;洪武二十七年后先令徐辉祖与安陆侯吴杰等往浙江防倭,后令他前往陕西训练防西番之兵马;而李景隆主要在陕西训练兵马士卒,执掌与西番勘合贡马事务,整理肃州五军卫,还曾佩平羌将军印讨伐叛乱诸羌人部落等事<sup>[3]</sup>卷3,遼国名臣记,整体来看二人受到的锻炼在第二代勋贵中是最丰富的,能够充分体现朱元璋对其能力的殷切期望。

而在老一代勋贵中,朱元璋令武定侯郭英长期协助辽王与燕王管理辽东与北边军务,长兴侯耿炳文管理陕西兵马军务及屯田事,并在洪武二十八年以子耿璘尚懿文太子长女江都公主,又在洪武三十年正月以耿佩征西将军印任总兵官,郭为副手备边,并平汉中民变。因而《明太宗实录》评价二人:“太祖末年旧人在者,独英及长兴侯耿炳文特见倚重”<sup>[2]</sup>卷17,永乐元年二月甲子条。从靖难之役中上述四人先后起到的作用来看,朱元璋在洪武晚期的这一系列布局不可不说是用心良苦。

因此,在建文朝政局正式拉开序幕之时,以姻亲关系为纽带,以担任武职为功能的诸洪武勋贵家族成为朱元璋留给建文帝朱允炆一笔可贵的政治遗产。

## 二、靖难之役前洪武勋贵家族与建文帝及左班文臣之关系

清人邵远平在《建文帝后记》中评价建文帝:“(帝)性仁孝,好诗书典礼,有儒生气象”<sup>[3]</sup>丁集,别编,建文帝后记。建文帝即位后依靠文臣集团施行政治改革,既有继承洪武晚期体制由勋贵政治向文臣政治转变的需要,也有刻意笼络文臣集团作为执政基础的政治手段。这一特点是后人在分析建文帝执政特点时往往不加留意的。纵观建文政局中贯穿始终的两条施政主线——“削藩”与“改制”,无不表现出建文帝及其依仗的文臣集团浓重的儒家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理想主义在去除洪武弊政时发挥了正面作用,但在削藩及其诱发的“靖难”反叛时,又陷入了混乱与无力之中。这是因为建文帝“冲龄即位”,缺乏成熟的执政班底,迫切需要在在外有雄藩的局面中,笼络在洪武朝受到打压的文臣集团作为依靠,为此不惜破坏洪武祖制,刻意抬高六部尚书品衔,或以周礼为改制楷模,更改都门与宫门名称等等,这些更改频繁的举措反映出建文帝对自身统治

力的焦虑,但也行之有效地使建文帝与左班文臣在君臣名分之上更结为牢固的政治盟友。

洪武勋贵家族作为武臣集团的核心,虽是建文帝削藩政策的直接执行者,但与诸藩王的联姻关系及洪武朝与诸王历次军事行动合作形成的默契,都难以令建文帝与文臣集团完全信任。而面对文臣集团对建文帝施政决策影响的日益加深,洪武勋贵家族立场的摇摆不定可想而知。随着靖难战局的日益恶化,文武矛盾从无到有,愈演愈烈,最终撕裂了建文政局产生的共识,构成了建文朝政崩盘的主要诱因之一。

然而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建文帝继位至建文元年七月靖难之役爆发,可以视为洪武勋贵家族与建文帝及左班文臣关系的蜜月期。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建文帝召方孝孺入京为翰林侍讲,建文朝文臣集团之“齐、黄、方”三驾马车体制正式形成。随即七月有人密报周“王与燕、湘、代、岷四府通谋”<sup>[4]</sup>卷上,周府长史王翰几次劝谏无用,自断手指诈狂隐退<sup>[5]</sup>卷十一,建文帝遂用黄子澄策,以周王为燕王同母弟,削周王藩即为翦除燕王羽翼,遂令曹国公李景隆突袭周王府,迁周王及王府家眷抵京并迁于云南。这是洪武勋贵在建文朝参与削藩的首次行动。

建文帝之所以选择曹国公李景隆执行这一行动,主要是基于李景隆于洪武三十年八月起,受命佩征虏大将军印前往河南训练士卒,周王封地及护卫军处于其管辖范围之内。另外,也由于李景隆同其他洪武勋贵相比,与方孝孺、黄子澄等人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其中尤其以方孝孺为甚。方孝孺《逊志斋集》中录有《春风和气堂记》一文,系在建文朝肇始前,应李景隆及友人林右邀请,为其私宅落成所做。其中称赞李景隆“年盛而志博,质壮而气和,为天子近戚重臣,而笃学下贤,嗜好与韦布之士类”,同时又回忆自己少年时跟随父亲济宁知府方克勤面见李景隆父李文忠时的景象:“王喜而体貌之,从容笑语,以国士见期,今十有五年矣”<sup>[6]</sup>卷十七,李景隆及其父李文忠洪武朝便有好士之名,李景隆尤其“读书通典故”,在勋贵群体中颇得文臣好感。削藩大计的第一步由李景隆来完成,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建文帝同时还对其他洪武勋贵做出了调整。继位后即令武定侯郭英子驸马都尉郭镇前往辽东赏赐边军,而九月西平侯沐春因病亡故,令其父黔宁王沐英次子,后军左都督沐晟承袭西平侯爵位,十二月充总兵官镇守云南。这一承袭除了稳定局势,配合当时征虏将军何福对金齿等地百夷的征讨外,也有震慑与沐氏素来不和、野心勃勃的岷王之意。建文元年,沐晟果然控告岷王举动不法,建文帝遂废岷王朱榘为庶人,迁往漳州<sup>[7]</sup>卷118,列传第六。另外又召还洪武二十八年获罪与都督杨文从征龙州的江阴侯吴高和安陆侯吴杰,以及先前位于山东练兵的魏国公徐辉祖。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又进魏国公徐辉祖为太子太傅,与曹国公李景隆共掌六军,以图燕王<sup>[8]</sup>卷4。

进入建文元年后,建文帝开始着手在北边完成

对燕王朱棣的军事包围。二月九日,首先“令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接着令长兴侯耿炳文子都督彛事耿璘执掌北平都司事务,左佥都御史景清署理北平布政司参议,参将宋忠与他们相互配合,监视燕王动向<sup>[9]卷2</sup>。郭镇自辽东赏军返回后不幸在二月病故,但从他所肩负的劳军工作及辽东军在靖难之役前中期对燕王叛军的牵制作用来看,郭镇的劳军也是建文帝完成包围网的一手先棋。因此方孝孺在郭镇的墓志中称赞其“能恪恭于位,令闻有称,可谓贤矣”<sup>[10]卷4.驸马都尉</sup>。

这一时期是洪武勋贵在各个位置上的活跃期,在职勋贵被提升秩衔,被削爵之旧勋贵得到起复;积极参与了削藩行动以及对燕王的包围网。造成这些举动的原因除却前期勋贵家族与建文帝及左班文臣之关系尚属良好外,洪武晚期缺乏富有经验的将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白沟河之战前燕王朱棣评价朝廷军将领:“(上谕诸将曰)李九江志大而无谋,喜专而违众;郭英老迈退谿;平安愎而自用;胡观骄纵不治;吴杰懦而无断;数子皆匹夫,徒恃其众耳”<sup>[3]卷6,(建文)二年四月乙卯条</sup>。这些虽不无为朱棣粉饰,贬低朝廷军将之意,但依然能够反映出建文时期将才稀缺的不利处境。

### 三、靖难之役期间洪武勋贵家族与建文帝及左班文臣之关系

建文元年七月癸酉,燕王朱棣于北平杀布政使张昺、都司谢贵等,正式以“清君侧”名义起兵。八月戊戌,建文帝派遣长兴侯耿炳文佩征虜将军印北伐平叛,之前长达一年的削藩行动终于引发了内战的恶果。对于洪武勋贵家族而言,耿炳文与李景隆主导的两次北伐失利引发了建文帝的信任危机,也是与左班文臣失和的开端。

参与耿炳文北伐军的洪武勋贵家族成员,尚有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和耿炳文之子都督耿璘,但在此之前曾经为建文帝“召对密言燕情”<sup>[11]卷十</sup>的魏国公徐辉祖则并未直接参与本次北伐。原因要追溯到三四月间发生的“燕王三子入朝”事件。在双方日益剑拔弩张的关键时期,如何处置具有人质意义的燕世子兄弟三人成为了一个难题。齐泰主张扣留;黄子澄主张将其放还以麻痹燕王;而徐辉祖弟徐增寿及驸马王宁则力保三人无害。建文帝遂依照徐增寿等人建议拟送三人遣返,朱高煦却潜入徐辉祖厩中盗取良马逃走,追之不及,这次争论也以放走燕世子与朱高燧不了了之<sup>[12]</sup>。朱高煦为何在已经决定遣返三人时突然选择夺马逃走,又在看守严密的软禁状态下进入徐辉祖宅获得马匹?就这个问题,王世贞在《魏国第一世嗣太子太傅徐公表忠传》中考证道:“(燕王返国)而留次子高阳王待命于邸,欲藉公为耳目,公谢绝之。高阳王微闻诸大臣谋有所不利于燕王,即夜窃公善马归燕。”<sup>[13]卷69</sup>也就是说,燕王三子入朝,不仅有探听朝廷讯息、诈称无反叛意的目的,还怀着策反徐辉祖等洪武勋贵的目的。而在策

反失败、诸文臣将不利于燕王的消息走漏风声之后,朱高煦则孤注一掷窃马而逃。这一举动令文臣集团与徐辉祖本人都十分被动,建文帝有理由怀疑徐辉祖的立场,文臣集团为摆脱走漏风声之罪名,也可能将责任推卸给徐辉祖。虽然建文帝表现出“益亲信之”<sup>[14]卷19</sup>,但建文四年之前徐辉祖始终不得独当一面,只能承担接应或练兵工作,可见这种信任并不牢稳。

八月,耿炳文军在真定惨败,本人战没,驸马都尉李坚、都督宁忠、顾成等被俘,动员了30万人的第一次北伐以惨败告终。另选新将、收拢败军的难题再次摆在建文帝面前。在选择李景隆或徐辉祖领兵的问题上,《徐公表忠传》对此记载道:“……曹公有公卿间声,而公终以燕戚属故见左”<sup>[13]</sup>。然而在文臣集团内部,在否定了徐辉祖之后,是否使用李景隆竟然激发了文臣集团内部激烈的争吵。黄子澄力荐李景隆,《姜氏秘史》作者姜清认为方孝孺的推荐也起到了决定作用,“又谓孝孺与景隆父子交谊甚笃,景隆帅师北伐寔由孝孺”<sup>[15]</sup>。而齐泰与礼部尚书陈迪则上书反对。陈迪指责李景隆“奸邪不忠,不可使任兵权”<sup>[10]卷3</sup>;而都御史练子宁更是在散朝后抓住李景隆的头历数其罪,伏地请诛杀之,导致建文帝怒而罢朝。或称练子宁对李景隆的人身攻击在李景隆德州兵败返京时发生,“(练子宁)顿首号曰:败国事者,此贼也!”<sup>[4]卷中</sup>在朝堂之上对勋戚重臣加以侮辱,这种在洪武年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除了证明建文帝大开言路外,也能体现当时文臣集团地位上升,“扬眉吐气”后对武臣的鄙视。这种俨然有明代晚期朝堂争斗的气氛,对于团结力量一致对外是极为不利的。

九月,建文帝命李景隆为征虜大将军,北上伐燕。本次北征动员了几乎所有能够出征的勋贵家族成员,如武定侯郭英与驸马都尉胡观随军北上;起用因老迈居家闲住的俞通渊,以豹韬卫指挥使职充偏将从征;吴高、耿璘、杨文等指挥辽东兵南下包围永平。即便如此,在第二次北伐前后,洪武勋贵家族成员遭到的冷遇也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例子即为诚意伯刘基次子、谷府长史刘璟的遭遇。

刘璟随应诏南归的谷王朱橞返回京师,也被委任随李景隆军参谋军事。刘璟洪武年间便有文名,自幼亲近皇室,洪武二十三年让爵位给兄子刘廌,受命任闾门使,朱元璋喻之:“朕欲汝日夕左右,以宣达为职,不特礼仪也”<sup>[1]卷128,列传第16</sup>。后刘璟任谷王左长史。明代对其父刘伯温的传说化也扩展到了刘璟身上,有太祖亲赐“除奸敌佞”铁劄令其检查百官得失,任谷府长史期间“提调肃、辽、庆、宁、燕、赵六王府事”的传说<sup>[16]卷1,诚意伯次子闾门使刘仲璟遇恩录</sup>,王世贞曾在《弇山堂别集》中对此传说进行过辨伪。刘璟作为洪武勋贵家族中仅存的文官家族,虽有佳名,“喜谈兵”,建文帝赞赏其能力,但却始终不给予其应有的重视。刘璟随谷王返京时便献十六策,建文帝不能用;在李景隆军中,献计不用;白沟河兵败后,刘璟回京养疾,进《闻见录》,建文帝令其归家养疾,至此刘璟在建文

军政中几乎完全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建文帝的多次“不用”，是“不能用”还是“不屑用”？这至少是一种人才上的浪费。

驸马都尉梅殷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也能反映出上述问题。梅殷为汝南侯梅思祖从子，尚马皇后所生宁国公主。梅殷本人性恭谨而有谋略，素养极高，洪武朝曾任山东学政，被朱元璋下敕书称赞为“精通经史，堪为儒宗”，并有“太祖托孤”之传说<sup>[1]卷121,列传第9</sup>。洪武十七年十月，梅殷曾与李坚等驸马都尉一同前往北平校验户口，赈济灾民，对北平一带兵马户口等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然而直到建文三年十二月前后，建文帝才委命梅殷镇守南京北方门户淮安。此时朝廷军兵员接近枯竭，梅殷从民间动员义军，“募淮南民兵合军士号四十万”<sup>[17]卷4</sup>，并割燕王使者耳鼻拒降，迟滞了燕军直接沿运河南下的图谋，迫使朱棣绕开淮安另寻他路渡江。而之所以建文帝靖难战事前期不重用梅殷，可以说是基于梅殷妻子宁国公主与燕王良好的兄妹关系。可以看出，勋贵家族与燕王的姻亲关系，直到此时依然干扰着建文帝的政治决策。

李景隆自从河间出兵后，围攻北平不下，后败于郑村坝。建文二年二月援大同不利，连败于河间、德州、济南，终于全军崩溃。李景隆之败作为一个节点，洪武勋贵在第二次北伐之后人才或死（俞通渊），或被贬（吴杰），或被搁置（郭英），基本上已经丧失了作战事务中的发言权。而盛庸、平安、何福等非勋贵出身将领的崛起，也为建文帝与文臣集团找到了背景更为安全的可用人才。此时残存的洪武勋贵日益被边缘化，几乎已经成为定局。

同时这一时期在朝廷军中，普遍的监军体制也建立了起来。通常认为广泛使用宦官监军的制度是在永乐年间建立起来的，但靖难之役中建文帝也派出了内臣监军。据《奉天靖难记》载：吴杰、平安军中有内臣长寿受命监军，建文三年正月乙丑，燕军与朝廷军在深州前线爆发战斗，长寿被燕军骑兵捕获<sup>[18]奉天靖难记</sup>。而文臣也被普遍派往各军中履行监军职责。如建文二年六月，“使监察御史周观政监徐州兵”；又令陈性善以副都御使职监李景隆军，此人白沟河战役中兵败自杀<sup>[10]卷10</sup>；建文四年正月，燕王朱棣发动总攻之后，文臣被普遍发往各地募兵、筹粮，或直接派出监军或直接督师。如文学博士黄彦清在靖难战事结束后尚在驸马都尉梅殷军中，并在建文四年十二月私谥建文帝<sup>[10]卷10</sup>；刑部尚书侯泰驻淮安总理军饷并得便宜行事；兵部侍郎陈植则督师江上，被督将所害等等<sup>[10]卷10</sup>。

人格侮辱，监军制度，变相褫夺洪武勋贵兵权，在军内激起的反弹是可想而知的。燕王朱棣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矛盾，在上建文帝书中指责“不意在朝左班文臣，（如）齐尚书黄太卿等官，皆是奸邪小人，贪墨猾吏”<sup>[15]</sup>。靖难之役告终后，又专门立“左班文臣奸榜”二十九人，以示引发内战责任尽在文臣一方。高巍早在靖难军兴起时就及时戳穿了朱棣的分化举

动，上书称：“大兴甲兵，侵袭疆宇……以为殿下假诛左班文臣，实欲效汉之吴王倡七国以诛晁错为名也。”<sup>[15]</sup>然而，这并不能阻挡武臣对建文朝廷丧失信心的洪流，“武臣率怀携贰，叛附接踵，其临阵生心，甘心虏缚者，多至千人，皆身为将帅都督指挥者也”<sup>[12]</sup>。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 四、洪武勋贵家族与藩王之关系

如前文所述，洪武勋贵家族与皇室的关系是通过频繁的通婚所巩固的。这一关系最早可以上溯到朱元璋本人纳郭英妹郭宁妃为始，在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更是普遍在勋贵子女中为藩王选择王妃，这种历代王朝都善于使用的笼络方式将藩王与勋贵在利益和血缘两个层面捆绑在了一起，日后洪武勋贵与藩王虽有摩擦，但合作则更紧密。然而，时至建文朝，姻亲关系反而促使建文帝与洪武勋贵家族顿生芥蒂，对自己处境惶恐不安的藩王也极力拉拢与利用洪武勋贵，因而建文朝覆灭的最后一根稻草——李景隆与谷王开金川门放燕军入城，是历史的偶然，也是这种权力纠葛发展的必然。

在洪武勋贵与建文帝的蜜月期中，藩王地位岌岌可危，甚至要向勋贵行贿以免遭责难。如《建文年谱》记李景隆执行废周王任务时，“景隆大索金宝，王不能应”，亦有说“景隆受贿至金宝七拾”<sup>[15]</sup>的。而后随着削藩的日益白热化，与洪武勋贵家族直接具有姻亲关系的藩王也被卷入其中，如湘王朱柏更是闭门阖家自焚，湘王王妃也随之殒命。王崇武在《明靖难史事考证稿》提到，湘王之死诱发了建文帝对身为湘王王妃从兄弟江阴侯吴高忠心的怀疑，并轻而易举地中了燕王朱棣反间杨文与吴高关系之计，免吴高职，贬斥其至广西，对辽东军的指挥系统造成了恶劣影响<sup>[19]</sup>。这也是靖难之役初期建文帝的重大决策失误之一。

而建文朝政中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两大“内奸”：李景隆和徐增寿与诸藩王、尤其是与燕王朱棣之关系，一直是语焉不详或是自相矛盾的。二者立场的变化有所异同，但出发点并非仅仅为后世史家所称的贪图财货，而应是基于更深层次的政治投机，同样，燕王朱棣在破坏洪武勋贵家族与建文帝及文臣集团的关系上显示出了高明的政治手腕。

徐增寿为中山王徐达三子，魏国公徐辉祖之弟，从《明太祖实录》中关于徐增寿的记录来看，他在洪武朝便以勋贵子弟及“谨实寡过”受命任左军左都督，侍宿卫。查洪武前期朱元璋命郭英侍宿卫，可以看出这项工作是与皇帝联络极为紧密的，也是帝王亲信的表现。除此之外，徐增寿与李景隆曾经共同赴陕西防边，同时也曾从燕王北上平乃尔不花之乱。在这场战役结束后，“班师入见仁孝皇后，还朝数与文皇往来”<sup>[20]下卷</sup>，徐增寿与燕王朱棣关系的亲密，与其兄长徐辉祖对燕王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徐辉祖与驸马梅殷提督南京武学，执掌诸藩王、勋贵、诸世袭武职子弟之教育<sup>[10]卷83</sup>，除从征北平外，因公务

也多次来往南京与北平之间,他与朱棣之间的关系是否亲密无明确记录可证,但从“燕王三子事件”中双方的立场来看,建文帝“以中山王女燕藩正妃,召辉祖及其弟增寿议之。辉祖执不可,增寿独力为庇,乃悉遣归”<sup>[10]卷83</sup>。徐辉祖意识到燕王三子的价值主张将其扣留,而徐增寿利用了建文帝对自己的信任,成功放走了燕王三子。而在随后的战事进展中,燕王始终没有放弃对徐氏兄弟的争取,《徐公表忠传》记载:“(燕王)其世子高阳王皆阴饵公为内应,公确然不挠,乃改饵公叔弟”<sup>[13]卷69</sup>。作为洪武勋贵中优先争取的对象,燕王是在诱惑徐辉祖失败之后才将主要策反对象放在徐增寿身上的。徐增寿与徐辉祖二人立场的不同被敏锐的文臣集团所注意,户部给事中陈继之曾上书指出:“徐增寿,燕之至亲,心有阴谋,请诛之。(建文帝)不听。”<sup>[11]卷12</sup>随着战局的日益恶劣,勋贵家族与文臣集团关系撕裂,徐增寿受命图谋开金川城门迎燕王入城,被监察御史魏冕发现,“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之几死,会辍朝,冕及大理寺丞邹瑾当陛大呼:请速加诛,臣等义不与此贼同生!不听。”但建文帝最后终于“手诛徐增寿于左顺门……欲并诛景隆不果”<sup>[21]卷12</sup>,次日,李景隆与谷王开金川门,建文朝三方的纠葛就此结束。

燕王对徐增寿未有刻意策反,更多以血肉亲情作为维系。而对于李景隆的策反则有一个持续的过程。历代史家对李景隆评价始终不高,无论是站在建文帝角度还是靖难史事的官方书写者角度。《明太宗实录》中记录朱棣对李景隆挂帅一事如此评价:“李九江,豢养之子,寡谋而骄矜,色厉而中馁,忌刻而自用。况未尝习兵见战阵,而辄以五十万付之,是自坑之矣。”<sup>[2]卷4上,洪武三十二年九月戊寅条</sup>。然而,李景隆自从洪武二十年随冯胜、傅友德北伐;随后湖广、陕西练兵,协助建甘肃诸卫所,又征西番部落反叛,掌管与西番茶马贸易,可以证明其不仅具有充足的军事指挥能力,而且实战经验比徐辉祖等二代勋贵要更为丰富。朱棣的言论,更多应该是后世史家为塑造其无敌形象而做的粉饰。

而就李景隆身份从败将到“贰臣”的转变,清人夏燮认为,李景隆是从转交燕王上书而没有得到朝廷回音,从而开始怀疑左班文臣对自己的信任的。“癸亥,景隆遗燕王书请息兵。王答书索齐泰、黄子澄等,又以前两次上书悉不赐答,此必奸臣虑非己利,匿不以闻,今备录送观之。景隆得书,遂有贰志。”<sup>[22]卷12</sup>燕王又在答李景隆书中为自己辩诬,同时以血亲关系笼络李景隆:“余太祖高皇帝之子,汝太祖高皇帝之甥,至亲也。”然而先前黄子澄多次掩盖李景隆前方败绩,“时景隆出师屡败,子澄等匿不以闻……帝信之,加景隆太子太师,遣使赐貂裘珍醢。”<sup>[4]卷中</sup>此时黄子澄为李景隆掩饰,也是在为自己脱罪,双方矛盾直到李景隆被召还方才爆发。而李景隆在建文二年召还后一直居家闭门不出,在朝堂上亦受到文臣集团不屑,在燕军临城之际,李景隆与同样遭到冷遇的谷王一拍即合,开门迎降,完全可以

追溯到燕王之策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 五、结语

靖难之役结束后,燕王朱棣继皇帝位,在清洗了左班文臣集团后,在随后的事件中利用陈瑛等对残余的洪武勋贵进行了进一步的清算。驸马都尉胡观、梅殷遭迫害而死,魏国公徐辉祖幽闭于家,后病死,子徐钦因罪除爵;耿炳文全族皆以建文余党名义或死或流;未参与建文朝战事的凤翔侯一族也无罪除爵;而降燕之李景隆、吴高,也在永乐初年因罪除爵。除武定侯郭英与徐增寿追封之定国公之外,洪武勋贵家族基本在建文朝后完全退出了明代政治舞台,虽明代于弘治及嘉靖年间对旧开国功臣有所接续承袭,但造成的长达百年的大断裂,已经让洪武勋贵家族从开国元勋的政治地位上跌落谷底,不复再起。

洪武勋贵对建文政治的干涉起于其世族贵胄地位的责任感,也基于其试图在打击藩王势力过程中重树洪武初年的勋贵政治。然而文官集团在建文帝扶植下的崛起打断了洪武勋贵的企图,也将其弱化为单纯的武臣集团。在一步步的矮化之中,洪武勋贵难以发挥其作用,最终随着建文政局的崩塌退出历史舞台。勋贵集团何以自处?这是上接洪武,下启永乐,最终将勋贵权力拘束到皇权附属品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期,是建文朝重文轻武政策发展的必然,也是再审视建文帝政治决策利弊的一个新视角。

## 【参考文献】

- [1]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明太祖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3] 李贽. 续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赵士哲. 建文年谱[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 [5] 谈迁. 国榷·卷十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6] 张潮. 昭代丛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7] 方孝孺. 逊志斋集[M]. 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
- [8] 郑晓. 建文逊国臣记[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 [9] 焦竑. 国朝献征录[M]. 扬州:广陵书社,2013.
- [10] 屠叔方. 建文朝野汇编[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 [11] 陈建. 皇明通纪集要[M]. 明崇禎刻本.
- [12] 朱鹭. 建文书法拟[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13] 王世贞. 弇州山人四部续稿[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4] 王世贞. 弇州史料前集[M]. 明万历刻本.
- [15] 姜清. 姜氏秘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16] 刘基. 诚意伯文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 [17] 黄佐. 革除遗事节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8] 邓士龙. 国朝典故[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19] 王崇武. 明靖难史事考证稿[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20] 郑晓. 皇明异姓诸侯传[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21] 陈建. 皇明从信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22] 夏燮. 明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责任编辑 李兆平】